



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困境流动儿童 及家庭需求调查报告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17年6月



目 录

一、研究概述	3
(一) 社会融合理论综述	3
(三) 研究方法	6
二、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会融合现状	6
(一)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现状	6
(二)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文化融合现状	8
(三)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融合现状	9
(四)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现状	11
三、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会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12
(一)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12
(二)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文化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12
(三)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13
(四)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14



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

需求调查报告

一、研究概述

（一）社会融合理论综述

宏观的社会融合理论的源头是社会团结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的“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不同整合逻辑区分。对此进行过重要论述的有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著作《自杀论》（1897）中首次提出，他在劳动分工的论题下勾勒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分别描述主观的集体良知的文化融合（整合）社会，以及客观的分工以来的结构融合（整合）社会。他认为较好的社会融合水平可以防止由社会原因导致的自杀，社会凝聚要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有机团结、社会融合（整合）来实现。滕尼斯则将社会融合（整合）分为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是基于原始的或天然的本质意志的关系整合，社会是依赖选择意志的利益整合。而韦伯将社会融合（整合）机制分为传统支配和法理规制两种不同的整合机制，传统支配的合法性源自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地位关系向来如此”；法律规制依靠法律规范和组织纪律等非人格化的“公共权威”。对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学者以“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Cooley）、“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Redfield）来区分。初级群体是通过面对面互动和“镜中我”获得个人在人际关系、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乡土社会则是通过熟悉的人际关系实现整合。宏观的社会融合理论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进一步受到关注。

帕森斯的“AGIL”模式把共同体作为“融合（整合）系统”，并将其与文化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并列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而1970年代后，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沿着社会融合（整合）与系统融合（整合）的概念推进融合（整合）理论。洛克伍德认为，“社会融合（整合）即行动者之间既有序又冲突的关系；系统融合（整合）指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既有序又冲突的关系。”哈贝马斯重构AGIL模式，帕森斯的四个子系统被分成两个层面：模式维持系统（L）和整合系统（I）构成了生活世界，从事象征意义的再生产，是协调行动者取向的机制，要求重新规范集体良知的道德内容；经济系统（A）和政治系统（G）构成体制，从事物质利益再生产，是确保行动的意外后果在功能上相互契合的机制，是社会各单位之间相互依赖和交换所产生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社会融合的中观理论，也称族群模式，理论形态包括同化论和多元主义。其中同化论有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帕克的循环论和戈登的同化过程理论。熔炉论的典型代表是芝加哥学派帕克及其合作者和学生，他们较早对社会融合进行了系统的关注，1921年，帕克和博格斯给出了融合的概念：“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的经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他们认为社会融合就是将来不同民族的少数族裔带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社会过程。随后，帕克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给出了一个更明晰的定义：社会融合是对一种或一类社会过程的命名，通过这种或这类的社会过程，出身于少数族裔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最终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使文化整合的水平至少能够维持国家的存在。循环论指出族群经过四个阶段的互动（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最终达到完全同化；同化过程理论提出同化的七个维度：文化或行为同化、社会结构同化、婚姻同化（族际通婚）、身份认同的同化（族群意识的认同）、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同化。多元论则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以达到族群文化的多元共存。而Alba和Nee（2005）把美国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定义为“种族差异的消减，以及由种族差异所导致



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的消减”。“族群理论”与“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相互促进，实证研究为族群理论提供实践材料，而族群理论则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族群模式指导下，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关注了许多现实问题，如移民、贫困、社会分层和社会排斥等。在族群模式的指导下，实证研究开发了系列融合测量的手段，如“社会距离”测量就是族群模式发展的结果。芝加哥学派继承了齐美尔的社会距离概念，帕克指出，距离是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密的程度和等级。美国社会学家鲍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更是为社会融合测量奠定了基础。而戈登的社会融合七个维度更是社会学领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

微观社会融合理论主要围绕社会心理建构“认同”和“接纳”展开。认同是个体对自我或群体的认同，接纳是群体对个人的接纳。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回答“我是谁”，辨别自我身份和自我同一性，经历詹姆斯的“社会我”、库利的“镜中我”、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哈贝马斯的自我发展等阶段。主要观点有：自我需要社会群体来建构；自我认同源自于个人经历的反思性建构；自我认同会随着现实的变化和自我的反思性活动而发生变化。社会认同旨在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围绕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就个体如何积极融入群体、整个社会应如何维护团结和凝聚力展开讨论。社会认同理论由塔吉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学生特纳在80年代中晚期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认同理论。接纳理论包括自我接纳、同伴接纳和社会接纳。自我接纳和自我认同相似，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或者对自我认同的强化和肯定。同伴接纳和社会接纳是接纳研究的重点。同时，在社会接纳的测量方面也发展了相应的量表，如费伊的“接纳他人量表”和Bond与Bunce的“接纳量表”等。关于认同和接纳理论在社会融合研究中的作用，黄匡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自我认同理论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提供了可能；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认同是社会融合的关键，突出了个体在社会融合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个体的社会融合心理和能力是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同时，也为分析群体间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提供了心理学动力机制视角；接纳理论强调同伴接纳对个体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强调群体或个体实施接纳的积极效用。

回顾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合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融合是基于移民与流动人口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融合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多层次多环节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实证研究中，利用分类划分社会融合的维度及指标，并对社会融合程度进行测量是国内外社会融合研究的主要方法。帕克和博格斯是最早对社会融合进行测量的学者，他们将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区分为四种主要的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文化融合。Landecker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融合、交流融合、功能融合和规范融合。戈登研究美国族群融合问题时，提出从七个层面综合测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1）文化或行为同化；（2）社会结构相互渗入或融合；（3）族群间通婚；（4）族群意识或身份认同；（5）族群偏见消除；（6）族群间经济、就业、教育等领域歧视行为消除；（7）公共事务融合。

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融合测量维度的分类体系也越来越复杂和细致。高登纳斯特和李奇蒙德在《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研究》（1974）中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提出了影响移民与迁入地适应的七大类因素。客观因素有四个：（1）经济，包括行业、职业、收入、消费；（2）文化，包括语言学习，移民和接受地之间文化产品和文化象征性的互换（饮食习惯的转变到宗教或道德信念的转变）；（3）社会，初级关系形成、正式组织参与度；（4）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和有效执行、代表移民和少数群体特殊利益的组织形成。主观因素有三个：（1）自我意识的转变；（2）



对接收地的态度和价值的接受与内化；（3）对移民后生活的满意程度。杨格-塔斯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有三个维度构成：（1）结构性融入，涉及到移民少数族群在诸如教育、劳动力市场、收入与住房等方面的境况；（2）社会-文化性融入，主要体现为对于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外群体进行人际沟通能力的发展以及按照东道国的行为模式进行行动的过程；（3）政治-合法性融入，重要指标是是否获得了与当地社会公民同等的政治合法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是否在身份、政治待遇上给予同等对待。

恩泽格尔在杨格-塔斯的基础上提出了4个维度：（1）社会经济融入，主要是指移民在经济就业、收入水平、职业流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社会性活动与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的改善；（2）政治性融入，涉及移民群体的合法政治身份（合法公民权）、移民的政治参与、移民的市民社会参与；（3）文化性融入（多元文化主义与同化主义之争），主要通过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基本规则与规范的态度、配偶的选择、语言能力、犯罪行为等指标进行测量；（4）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包括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对于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东道国社会（主体社会）的态度（对移民群体是接纳还是拒斥态度）。

国内社会融合测量主要集中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这是推动国内社会融合理论及融合测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农民工社会融合测量建立起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维度。随着研究深入，指标体系维度也呈现多样化，如王桂新、罗恩立提出“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四个维度，张文宏、雷开春提出“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经济融合”四个维度，杨菊华提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四个维度，陆淑珍、魏万青提出“身份融合、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经济适应”四个维度，悦中山、李树苗等提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周皓提出“定居/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心理观念、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五个维度。

国内外社会融合测量取得了大量成果，有关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也比较成熟。然而，由于社会融合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多个维度。不同背景下的社会融合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不同背景、不同研究目的下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选择的侧重点也就自然各具差异。

但纵观社会融合理论与测量研究，我们发现，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结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等）融合、心理融合（适应与同化/身份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维度。

（二）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也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时期，大城市在就业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的进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出现“多元化”趋势，不仅分布于东部大都市圈、沿海城市带，中西部城市群也成为流动人口新的增长极。与此同时，进城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变多，流动人口个体式务工与家庭式务工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夫妻共同外出务工或携领子女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称，人口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有所扩大。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与2010年相比，2014年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上升了29.1个百分点，达到56.6%。相应地，在户籍地出生的比例明显下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留守儿童群体呈现数量减少的趋势，



相对应地，跟随父母进城打工的随迁流动儿童日益增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流动儿童数据达到3500万。

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市或从小就出生于城市并在城市生活，然而，多数流动儿童受户籍制度下的教育制度的影响，面临着难留难归的现实困境，不易融入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因为经济窘迫等困难，而陷入城市生存与求学的困境，更难能实现在城市的社会融合。

在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基于社会融合的视角，从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区（结构）融合、心理融合几大核心的维度，调查研究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区融合和心理融合几个核心方面的困难和需求现状，探索和创新系统而深入的困境流动儿童服务介入模式。

（三）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探访并结合十几年困境流动儿童服务经验，协作者设计了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访谈提纲。并在2016年6月至8月期间，走访了50名困境流动儿童的家庭，并对其中的12户家庭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调查收集到50名困境流动儿童的个人与家庭资料、12份深入访谈的个案资料。

本报告的调查分析采用个案资料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结合文献资料互为补充验证的方式。定量数据来自于50名困境流动儿童个人及家庭资料的数据统计分析，定性资料来自于12份深入访谈资料，以及对文献关联信息的提取。

因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走访和访谈的样本量有限，且调查仅在北京展开，本调查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局限。然而，排除区域和小样本量的局限性，本调查报告对于创新困境流动儿童服务仍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

二、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会融合现状

（一）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现状

经济融合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流动人口实现在流入地全面的社会融合的最基础保障。若流动人口不能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则会极大地制约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经济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在收入、消费、居住条件、社会保障与福利、就业状况等方面以流入地人群为参照对象的融入情况。如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具有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等，则表明他们在经济上成功地融合到了主流社会；反之，则说明其经济融合并不完全，如果大部分指标都与流入地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则说明流动人口基本没有实现经济融合，没有融入到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中。

在家庭收入和就业方面，项目走访的50名困境流动儿童的家长多为初中以下文化，普遍从事工地临时工、保安、保洁、保姆、摆摊卖菜、收废品等低技能的工作，收入均在3000元/月以下，与2016年北京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706元相比，相差甚大。



在消费支出和社会保障方面，近50%的家庭中有一名或多名病患，却因家庭劳动力仅能选择低技能的就业及其低收入，无法缴纳或承担社会保险费用，没有社保共同承担风险，多数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在经济上收不抵支，部分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甚至因为家人患病就医而欠下不少的外债。

“每月都要给孩子妈妈看病，我的工资不够用，现在房租已经7个月没有给交了，孩子妈妈为了给她交学费，就没有去看病，把看病的钱省下来给交学费，在交学费时，孩子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拿不出钱，看到妈妈把自己看病的钱拿出来要交学费，就告诉妈妈说，妈妈，不要给我交学费了，我不上学了，留着给你看病。”

——个案10，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奶奶之前心脏搭桥手术花了十几万，现在患有糖尿病，血脂高，一个月200-300元药费支出，我在外面欠债4万，和银行又借了2万，这些还没有算利息。家里的生活费、水费、电费、房租等花销都靠我一个人支撑，我不得不再找份兼职来维持这个家。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早上5点半就起，到晚上10点，所以和孩子见面的机会很少。”

——个案13，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对于来自城市社会的外部支持，绝大多数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反映，受到公益组织助学资助，而在经济上很少得到来自工作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仅有8%困境流动儿童家庭，有得到过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其中4%为北京本地居委会送过米油和衣服；另外4%为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向家乡县政府申请到了低保户。此外，个别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得到过工作企业送的过节食品。

对于政府支持的欠缺，多名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表示是由于救助政策上户籍的区分和限制。

“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口，这里的政府方面不给帮助。”

——个案49，流动儿童家长

“没申请过政府的救助，怕申请不上，是外地的。”

——个案01，流动儿童家长

目前，因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儿童及家庭被排除在北京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与公共服务之外。绝大部分的流动儿童都无法在公立学校就学，每学期需要缴纳不低的学费。部分困境流动儿童家庭中子女较多，且都处于上学阶段，家庭开销也存在收不抵支的情况。

很多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希望在北京等工作机会多的大城市谋生，但另一方面，因户籍制度衍生的城市外来人口政策导致的租房和入学的不易，让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生活和发展空间愈发逼仄。

“家里的孩子比较多，都在上学，需要大笔的学费，可是我自己负担不起，心里很惭愧。学费有时候交不齐。”

——个案37，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希望能在北京一直上学。”

——个案21，困境流动儿童的家长

“孩子妈妈身体不好，为了给孩子妈妈治病，我们来到北京，期望在北京治疗的医疗费用能低一些，全家的经济来源只能靠我一个人，压力很大。”

——个案24，困境流动儿童的家长

在居住条件方面，项目所走访的50户困境儿童家庭因为经济因素的考虑，都处在城中村或城区边缘地带，哪里便宜就搬到哪里居住。部分困境儿童家庭选择居住在拆迁区，随着居住区的拆迁，他们也不得不选择一次次的搬迁。这些不稳定的居住状态，对于困境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也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部分困境流动儿童的父母去世，由年迈的爷爷奶奶工作抚养，存在无人抚养的隐忧。部分困境流动儿童父母离异或离开，留下的家长的劳动就业挣钱的压力较大。

“我是单亲妈妈，要在北京抚养2个孩子生活压力大。下一步打算可能要回老家了，家里有不到一垧地（约15亩），可以靠种地为生。”

——个案01，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然而，虽然有困境流动儿童家长提出在北京压力大，但对于回家还是不回家发展，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对选择是迷茫的。调查中发现，有不少困境流动儿童家长面临着与个案36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一样的两难选择。

“孩子的学费，还有以后的升学问题，孩子只能回老家上学，但是老家挣不到钱，生活也会比较困难。”

——个案36，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整体而言，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方面的大部分指标都与流入地普通儿童及家庭存在较大差距，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状况不佳。协助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的城市社会融合，需要介入和缓解其家庭经济困境，增强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面对家庭困境和实现城市融合的自尊和信心水平，减缓经济融合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文化融合现状

文化融合，指流动人口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外表服饰、饮食、风俗文化等生活方式、地方历史文化和人际观念的了解和认可程度。文化融合受制于并反过来加速或阻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合过程。

通过重点抽查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较长，有50%的困境流动儿童从小在流入地出生，在流入地的最短居住时长也有4年的时间。然而项目走访的100%



困境流动儿童都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居住的社区也是流动人口聚集区，缺少与流入地当地儿童和居民相互交流和了解的机会。

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条件、家长工作时长、家长文化方面的自信度低等情况限制，也局限了困境流动儿童对流入地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仅有8.3%的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有享受过城市文化生活。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去玩过，我暑假的梦想就是去旅游去外面玩，看看水族馆中的动物，去欢乐谷玩过山车……但是爸爸妈妈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不敢出门。小姨的工作也很忙没有时间带我出去玩，我就一直在洗车厂附近游戏玩耍，可能去的比较远的地方也就是学校了。”

——个案06，困境流动儿童

多数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在语言和居住时间方面的社会融合指标都表现良好，但更深层次上的地方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人际观念方面的融合却并不乐观。

（三）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融合现状

社区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入地的社区各种面对面交往和合作的活动和俱乐部或当地组织团体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在流入地社区嵌入、社会交往圈扩大，在参与中敢于表达或更多的表达他们作为其中一份子的诉求和贡献，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和社区参与两个指标。

在社会关系方面，如同在文化融合部分所述，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缺少与流入地当地儿童和居民相互交流和了解的机会。调查发现，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关系更多的表现在原有的乡缘关系，实质性的社会交往圈扩大程度不明显。

困境流动儿童家长遇到困难，更多的是选择自己扛。而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亲戚老乡对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帮助最大，34%的家长表示亲戚老乡有介绍过工作；22%的家长表示亲戚老乡在家庭困难时有借或帮忙筹过钱。

朋友和同事在经济方面对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帮助整体较小，没有亲戚老乡的帮助那么突出。50%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表示邻居没有提供帮助；76%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表示同事没有提供过帮助；60%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表示朋友没有提供过帮助。此外，6%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明确表示没有得到邻居、朋友和同事的任何帮助。

“和邻居都不熟，没有交流。”

——个案21，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困境流动儿童家庭进入城市后，一般情况下会依靠拥有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人员，更多的情况则是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网络依赖的情况下进入城市社会。由于远离城市公共资源以及工作领域的底层化，工作繁忙而城市社会业余活动参与的机会和时间不足，导致其接触城市人口进而扩大自身社会交往圈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降低其在城市发展空间和就业预期，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进程，这加大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立足以及融合的难度。



而因为家庭困境、学校支持不足等因素导致的自卑和低自尊，一些困境流动儿童与打工子女学校同学老师的交往、学校融入方面也出现了困难。46%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表示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过支持，甚至有家长表示孩子在学校受到了排挤和不公正的待遇。

“都是民办学校，（学校的）不能让学校吃亏。老师没有给过帮助，之前还欺负过孩子。我期望学校和老师别对孩子那么刻薄，能照顾一下孩子。在学习上对孩子要求严格，生活上能适当的给予一些帮助。”

——个案11，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因为孩子长不高，走不动道，所以同学们老打击他，孩子不太想去学校。”

——个案12，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孩子在学校总是被同学欺负，被欺负了还不吭声。我期望孩子有互相帮助的同学，不要打架惹事。老师和学校对孩子好，关心就行。”

——个案20，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然而，40%的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不向自己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而60%的困境流动儿童向家长表达自己的困难后，仅有10%的家长能够采用比较有计划有技巧的方式进行回应。

“孩子会主动和我说他的学习困难，我也会联系老师，和老师沟通，学校老师就会在学习特别关注他。”

——个案13，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孩子平时不怎么跟我说话，心里想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太忙了，家长会什么的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觉得孩子很省心所以很少管他。孩子的学习有什么问题，平时爱干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个案03，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妈妈平时下班之后会睡觉或者去比较远的地方散步，我不愿意和妈妈去散步，也不太愿意和妈妈聊天。”

——个案03，困境流动儿童

困境流动儿童家长们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一定程度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疏离；困境流动儿童缺乏父母的帮助、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也不少见。有文献表明，流动儿童与父母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健康人格的形成，以及父母的理解支持，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

走访发现，困境流动儿童更容易在居住的社区（主要以流动人口为主）与其他儿童形成伙伴关系。然而，相对于学校同学的稳定性，困境流动儿童及其结识的社区小伙伴很容易因为家庭经济等原因，搬离社区而与彼此分离。困境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圈的稳定扩大受到极大局限，社会关系方面的融合度也比较乏力。



在社区参与方面，项目深入访谈的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约70%没有关注社区公共活动的意识，而剩下的30%的困境流动儿童家庭，也因为家长工作时间忙，都没有参与过社区方面的活动或事务。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在社会关系和社区参与两个社区融合方面的指标呈现度都比较低，因此，可以说，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融合度也比较低。

（四）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现状

心理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对自己在流入地的社会成员身份和归属感的认同上发生了变化的现象，是体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更深层次的维度。具体表现在对自己是哪里人的归属感、居留意愿以及与流入地居民的相互认可和接纳。

在归属感方面，如前所述，大部分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缺少关注社区公共活动的意识，他们也从未参与过社区方面的活动或事务。因此，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的城市社区归属感也就不高。

而在居留意愿方面，因城市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为了生存，他们在居留方面的愿意都比较强。然而，由于户籍制度下的教育政策对外地户籍和本地户籍学生的差异对待，困境流动儿童无法在流入地升学，不得不面临回老家上学的问题。

而在相互认可和接纳方面，因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缺少与流入地当地儿童及居民认识和交流的机会，因此，也很难谈得上对彼此的认可和接纳。

据走访了解，有4%的困境流动儿童家庭接受过陌生城市人群自发的帮助。

“之前住院的时候，那会儿需要住院费医药费，为了节省钱，孩子们经常没饭吃，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护士看孩子可怜，都给钱让孩子吃饭，多亏有好心人帮助，要不这孩子就和外面的野狗一样没有人管。”

——个案08，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之前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资助我家孩子上学，资助了2个学期，一学期是300元。”

——个案50，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然而，这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比较短暂和临时，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与爱心人士没有建立起关系或者建立的关系比较脆弱。

“后面就没有再资助了。孩子学校的校长把钱给我，我也不是很了解，只和小姑娘电话交流，没见过面，也不知道姓名。”

——个案50，困境流动儿童家长

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富足的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来说，他们的居住地往往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区以及环境等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地区。而有些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



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城市、两个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了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缘化。综上所述，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状况比较边缘或游离。

三、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会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一）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困境流动儿童的家长普遍从事工地临时工、保安、保洁、保姆、摆摊卖菜、收废品等低技能的工作，收入较低，缺少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居住条件也较差。而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多有病患，却没有社保等方式承担医药等费用；所有的困境流动儿童因户籍而被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每学期需要缴纳不低的学费；困境流动儿童家庭也缺少来自工作地政府、企业、社区等相关方的支持。多数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在经济上收不抵支，部分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甚至因为家人患病就医而欠下不少的外债。虽然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在城市谋生的意愿强烈，但因经济困难和户籍导致的租房和入学的不易，让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生活和发展空间愈发逼仄。

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在收入、消费、居住条件、社会保障与福利、就学就业状况等方面的大部分指标都与流入地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基本没有实现经济融合。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在经济融合方面需要服务的介入，改善外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支持环境，增强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面对家庭经济困境的能力和信心，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经济融合程度。

具体来说，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经济融合的服务介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针对因为疾病、贫穷等原因而陷入生活危机的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开展紧急救助与危机干预，募集社会资源参与物质救助，开展心理疏导和功能重建的个案工作，改善边缘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现实处境。

第二，协助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增强就业能力，协助流动儿童及家长提升理财意识和能力，提高家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倡导政府劳动保障和工会等部门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覆盖范围，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劳动力的参与率，让困境流动儿童家庭劳动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

第三，推动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所在的社区、学校和企业组织流动人口开展认识社区、学校、企业、城市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场所活动，促进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对城市社区的了解，提升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运用城市社区公共资源、促进家庭发展的能力。

第四，倡导政府推动与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有关的教育政策、社会救助与福利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从困境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就学、困境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多生子女教育补贴、再就业等角度为困境流动儿童家庭提供相关的救助福利和支持帮扶。

（二）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文化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成员缺少与流入地当地儿童和居民相互交流和了解的机会，对流入地风俗文化的了解也比较局限。虽然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在语言和居住时间方面的文化融合指标都表现良好，但更深层次上的地方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人际观念方面的文化融合指标却并不乐观。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在文化融合的深层次方面需要服务的介入支持，引导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认识流入地的风俗文化；增加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与流入地儿童及居民的交流互动、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机会，协助其吸收并灵活运用流入地的人际观念。

具体来说，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文化融合的服务介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以社区组织为依托，探索文化融合的机制，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文化参与。社区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和补充，是流动人口文化融合的重要场所。充分利用社区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通过组织新老市民的社区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与本地居民的文化融合。

第二，充分发挥企业或学校的文化建设作用，推动流动人口文化融合。企业和学校是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的聚集之地，与企业或学校合作，在企业或学校开展文化融合建设活动，把流动人口及流动儿童的文化融合纳入企业或学校文化建设内容，发挥文化融合的凝聚作用；把增进情感沟通、互动与提高文化素质相结合，促进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如组织开展“认识企业所在的社区文化”、“跨校际的城市文化交流活动”等协助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了解城市风俗文化，促进文化融合。

第三，合理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平台，拓宽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参与文化活动的渠道，提升主动参与文化融合的能力。

(1) 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利用文艺培训、读书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鼓励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在业余时间主动参加各种免费培训，增加与本地市民互动交流的机会。

(2) 引导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融合到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和文体组织中，参与绘画、文艺、摄影、写作、演讲等主题的文化兴趣小组活动，提升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社会表达能力，增强主动参与城市文化融合的能力。

(三)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流入地朋友和同事对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帮助整体较小，没有亲戚老乡的帮助那么突出。困境流动儿童缺少来自父母的社会关系方面的支持引导和示范，与打工子女学校同学老师的社会关系一般，与居住社区小朋友的社会关系不太稳定。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会关系更多的表现在原有的乡缘关系，实质性的社会交往圈扩大程度不明显。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多数没有关注社区公共活动的意识，加上家长工作时间忙等原因，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都表示没有参与过社区方面的活动或事务。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在社区融合程度较低，需要专业服务人员的介入，协助他们扩大社会关系和社区参与。具体来说，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社区融合服务介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推动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所在的社区、学校和企业提倡和组织开展节假日联谊等活动，引导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与城市邻居和社区干部、老师和同学、同事和企业管理者等主流人群进行交流互动，促进相互的理解、接纳和协作，促成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与主流人群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使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得到必要的社区、学校和企业的支持信息和资源。

第二，在社区开展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志愿服务意识和能力培育，以及多元群体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让主流人群参与志愿服务，协助主流人群与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增强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自我认同和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提升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社区参与度。

第三，家庭是儿童的心灵港湾，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应学会帮助子女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平稳过渡，这个过渡不仅仅是安排好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而是从心理上帮助孩子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因此，在提高困境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方面：

(1) 协助困境流动儿童家长提高自身亲职教育水平，真正理解自己的孩子，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和解决孩子在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了解子女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变化，掌握安慰和引导子女积极面对新的环境、并给予情感支持的理念和技巧。

(2) 协助困境流动儿童家长营造和谐温馨家庭环境的能力，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让困境流动儿童能感受到父母家人的爱和情感支持，增强困境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自尊和自信心。

(3) 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应对城市融入困境的能力。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家长也存在适应的过程，家长的适应性会直接影响困境流动儿童的适应，困境流动儿童会以父母为榜样来处理自己在适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困境流动儿童家长培养困境流动儿童克服困难能力的意识，促进困境流动儿童提高面对城市融入困境的心理韧性。

(四)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需求与服务建议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虽然城市居留意愿强烈，但缺少关注社区公共活动的意识，从未参与过社区方面的活动或事务，社区归属感不高；与流入地当地儿童及居民也缺少认识和交流的机会，彼此的认可和接纳度不明显，存在“一座城市、两个圈子”的现象，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身份认同比较边缘化，整体心理融合状况不佳。

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在心理融合方面需要专业服务的介入，协助他们与流入地儿童和居民形成相互认同和接纳的关系，提高城市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具体来说，困境流动儿童家庭的心理融合服务介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为推动困境流动儿童及家庭的心理融合，可以依托社区，积极探索流动人口参与的管理机制。通过搭建这样的共同参与、平等交流的平台，打破本地居民、城市主流人群与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间的隔阂，提高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在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使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不断增强心理归属感，形成一套良好的参与机制和组织模式，实现困境流动儿童家庭与本地居民家庭遇事共商、情感共育、困难共帮、文化共享、文明共倡、平安共保、和谐共促的局面。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Beij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entre for Facilitators

第二，开展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的自我与城市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协助困境流动儿童及家长认识自己的价值和潜能，提高城市社会融合的自尊和自信。

cccf